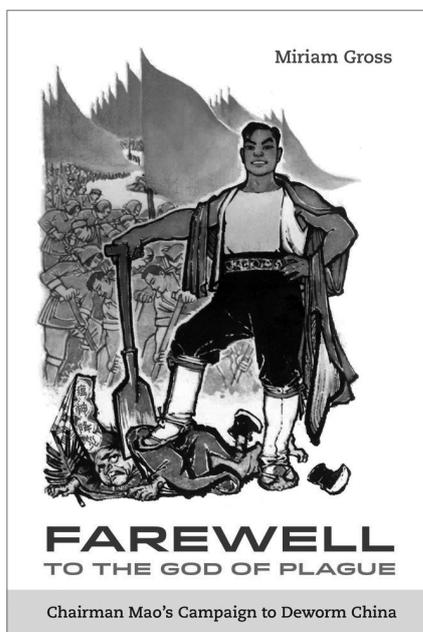


血吸蟲病防治與政治隱喻

——評 Miriam Gross,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 干霖

本書詳細分析了血防運動在各個時期的方式變化和不同結果，將中央與地方、醫療、科技與社會、政治相結合，勾勒出該運動從屢屢受挫到取得顯著成就的成功路徑，打破了大眾關於血防運動「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單一、片面印象。



Miriam Gross,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對於醫療史的歷史學解讀，從來不僅限於醫療學科本身的發展歷程。醫學手段在治療身體的同時，

也成為文化與政治隱喻的載體，對疾病的醫治象徵了一種技術性的統治，深刻地影響政治的表現和社會的反應。就當代中國史研究而言，醫療社會史因其資料的豐富性與題材的相對開放性，伴隨着新史學的發展正逐漸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高敏 (Miriam Gross) 教授的著作《送瘟神：毛主席的驅蟲運動》(*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以下簡稱《送瘟神》，引用只註頁碼)，便聚焦於血吸蟲病這一困擾中國已久的公共衛生問題，選取上海市區、青浦縣、餘江縣作為典型案例，依託實地考察和大量文獻資料，分析建國以來至1970年代末中共採取的防治舉措，對中央與地方的決策和行為抽絲剝繭，考察血吸蟲病防治運動(以下簡稱「血防運動」)最終取得成功的原因，展示了血防運動與政治結合，化身為一種政治隱喻的路徑，並總結出一套在資源投入有限的條件下應對傳染病的普適模式。

* 本文指導老師係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董國強，謹此致謝。

在今天的後疫情時代，她的觀點或許能夠為我們帶來對當前局面的新思考。

高敏於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獲得中國近代史博士學位，目前任俄克拉荷馬大學歷史與國際及地區研究副教授，研究範圍涉及1600年代以來的東亞、晚清和近代中國的公共衛生史、科學傳播史、旅遊文化史等。《送瘟神》一書脫胎於作者的博士論文，她蒐集了大量有關血防運動的檔案、報刊、回憶錄、採訪、照片等資料，實地考察了上海、青浦、餘江等具有代表性的地區，從多個維度深入探尋血防運動的始末。國內外不乏關於中國血吸蟲病的專門研究，但國內的期刊和論文多將注意力放在社會動員和成功經驗方面，缺少全域性的反思^①。本書依據詳實的史料，詳細分析了血防運動在各個時期的方式變化和不同結果，將中央與地方、醫療、科技與社會、政治相結合，勾勒出該運動從屢屢受挫到取得顯著成就的成功路徑，打破了大眾關於血防運動「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單一、片面印象^②。而作為海外學者，作者也敏銳地把中國的血防運動放在全球公共衛生運動的大環境下進行解讀，歸納可供他國借鑒的成功經驗，充分體現了作者深厚的史學素養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楊念群在分析晚清以來「東亞病夫」的稱謂時指出，治病由單純的醫療行為變成政治和社會制度變革聚焦的對象後，個體的治病行為也由此變成了群體政治運動的組成部分^③。這一將醫療問題政治化的邏輯同樣適用於對血防運動的研

究。本文將簡要概括《送瘟神》全書內容，重點梳理和分析血防運動在政治隱喻的作用之下由衛生運動演變為政治運動，並在更深層次重構「科學」、「迷信」等抽象概念的邏輯，藉此理解防治背後的醫療與政治的互動和博弈。

一 主要內容介紹

全書一共分為四部分，從血吸蟲病進入中共中央視野開始落筆，隨後深入分析地方對於血防運動的回應，最後指出該運動背後的政治邏輯與裨益。

第一部分從宏觀角度介紹了血吸蟲病得到中央關注的源起，及其如何在毛澤東與公共衛生部對血防運動的直接領導權之爭中上升為衛生工作的第一優先事項，簡要概括了整個運動的發展形勢。血吸蟲病直接與國家機器相聯繫，是從1949年5月在松江和青浦進行水域訓練的解放軍遭到感染開始，病患的特殊身份使得血吸蟲病首先作為軍事問題進入領導人眼中。隨着中央對地方控制的落實，血吸蟲病對疫區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負面影響也逐漸暴露出來：1953年，松江縣的適齡青年因患血吸蟲病而無法服兵役的比例高達73.6%（頁16）；血吸蟲病造成的勞動力減少、疫區大量土地拋荒等負面影響對新中國經濟狀況的打擊更甚。1949至1955年，公共衛生部迅速開展血吸蟲病防治模式探索和試點工作，並與1950年代的愛國衛生運動相結合，一系列行動綜合體現了中共急需改換國家落後面貌、彰顯制度優

一系列行動綜合體現了中共急需變換落後面貌、彰顯制度優勢的現實需要，這也使血防運動帶上政治色彩。然而，血吸蟲病防治是如何在眾多地方衛生健康問題中躍居第一優先事項呢？

在推動血防運動前進的三股力量(教育、預防、治療)中，實際上治療才是最有效的環節。然而由於基層技術人才的匱乏、藥物使用的風險、住院條件的有限等因素，它也長期為村民所恐懼和抵觸。

勢的現實需要，這也使血防運動帶上了政治色彩。然而，血吸蟲病防治是如何在眾多地方衛生健康問題中躍居第一優先事項呢？除去部分領導人受感染的個體體驗以外，這也與他們對此寄予政治期望有關。在地方，血防運動有利於整合鄉村力量，為農業集體化提供動力；在中央，毛則藉此向公共衛生部發難，批評它存在忽視農村地區、缺乏中醫參與、未能與黨的路線保持一致等問題。1955年11月以後，血防運動轉而由毛直接掌舵，以期通過中共及個人的直接領導，開拓一種新的衛生事業運行模式，同時確立黨在專業技術領域的絕對權威。

隨後，作者將目光下移至地方層面：第二部分圍繞血防運動在基層遭到的抵觸，指出該運動在權力結構與經濟方面潛在的阻礙。基層幹部對血防運動的支持程度是決定該運動能否成功的先決條件，他們需要承擔示範、組織、激勵、監督、與村民建立和諧關係等多重職能，是動員群眾的主力軍。然而，如果地方在運動中表現得過於強勢，必定會對中央權力造成挑戰，加之資源配給有限，種種因素都削弱了基層積極性。面對運動初期的窘境，中央選擇改變組織架構，建立領導小組，在地方開展工作。但由於基層幹部負責的防治站與省健康部指導的領導小組隸屬於兩個體系，互相挑戰對方的權威，因此在結構上產生了衝突。如果說權力結構的缺陷尚顯得對民間社會影響有限，那麼經濟考量則成為了更有力的因素：鑒於血防運動的資源消耗以及勞動力的分散，基層幹部經過利益權衡，往往會優先考慮短期的

經濟利益而忽視防治成功所帶來的長期利益。1950年代初，巨大的治療費用缺口使得村民對於該運動望而卻步，低微的醫治收入與國家補貼同樣困擾着醫務人員(尤其是中醫)。血防運動的開展同時是一場利益的博弈，該運動一開始的碰壁正反映了地方各股力量在種種因素之間的權衡。

第三部分着重分析推動血防運動前進的三股力量(教育、預防、治療)。為了鼓勵廣大群眾以科學的態度對待血吸蟲病，群眾教育作為該運動的重要一環在基層發揮作用。圖文、電影、講座、展覽會等種種教育手段看似考慮周全，但絕大部分都與農村的文化水平不相適應。作者認為，群眾教育的作用其實在於為村民提供理解血吸蟲病的語境，從而為預防和治療提供前提條件。就預防而言，雖然國家確立了「預防為主」的方針，血吸蟲病的預防在執行中也得到了較多的人力、財力投入，並作為一項政治任務被強加在群眾身上，但「預防」作為一項衛生工作的概念，本身卻始終未能被基層民眾正確理解。預防措施與鄉村傳統觀念屢相衝突，加上在實際操作中產生了理解偏差，被模糊、歪曲，因而沒有發揮出預期的作用。作者通過案例分析指出，實際上治療才是三者中最有效的環節。然而由於基層技術人才的匱乏、藥物使用的風險、住院條件的有限等因素，它也長期為村民所恐懼和抵觸。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期，政治熱情消解了前文提到的各種阻力，治療遂成為最有力的防治方法；三股力量同時發力，將血防運動帶向高潮。

第四部分創新性地從概念與結構入手，闡釋了公共衛生運動與政治隱喻結合所帶來的對「科學」、「迷信」的觀念重構，提出了「科學整合」(scientific consolidation)和「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兩個關鍵概念，分析科學技術的普及如何改變從中央到地方的治理結構，塑造出一批「又紅又專」的基層幹部。文革時期，由於原先的官僚機器被打碎，重建中央與地方的信息傳遞和事務處理機制顯得尤為緊迫——這正是通過「科學整合」實現的。農村幹部負責收集地方情況並向上匯報，他們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被納入黨制訂目標和推進運動的過程中，不需要武力或官僚制度從中協助，便能實現科學的信息整合。不論我們如何理解科學，基層幹部在具體的工作中必須採用科學方式，這點毋庸置疑。高級幹部和知識青年的下放客觀上促進了知識向農村傳播，鄉村青年在接受培訓、掌握科學工具後將其運用在工作中。「科學管理」不光是他們落實工作的工具，更成為了他們政治表演的憑藉。幹部通過一系列實驗、數據表現出工作的科學性，既順應了「科學整合」的需要，事實上也促進了科學手段的推廣和防治效果的提升。而這些因素直接導向文革期間血防運動的高潮。

最後的「結論」一章中，作者在橫向上將中國的血防運動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瘧疾防治運動對比分析，一成一敗，昭示了毛時代堅持長期防治的正確性和特殊時期建立特殊防治結構的有效性；縱向上則敘述改革開放時期的血防運動轉向和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

合症(SARS，又稱「非典」)爆發以後防治運動的復蘇，為歷史回顧畫上了句號——血吸蟲病及其他疫症的防治依然處於進行式，過去的防治模式也仍具有現實的啟發性。

二 血防運動的政治化路徑

根據作者的梳理，血防運動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一共出現了三次高潮：大躍進時期、文革時期、1990年中國加入世界銀行(World Bank)之際；前兩次高潮是本書重點論述的對象。僅是根據時段劃分，我們便很容易將衛生事業和政治運動相聯繫起來，而長時段的血防運動從發動到結束，都與政治隱喻密不可分。該運動無時無刻不受到政治運動的影響，蘊含了中央與基層複雜的政治想像。

如本書第一部分所言，在國家的考慮中，病人首先被視作兵源與農業生產勞動力而納入治療的範圍，而不是作為一個生而擁有生命健康權利的自然人。更重要的是，血吸蟲病等疫症在層層的信息傳導中被抽象化，在領導人眼中不再是單純的衛生問題，而是一個軍事、經濟問題，最後被政治化為意識形態層面的鬥爭對象。血防運動變成「對一切落後事務鬥爭的象徵」(頁18)，開展血防運動成為中共鞏固執政正當性、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必然選擇。這一點也體現於地方對血防運動認知的重構：在動員群眾的過程中，幹部有意識地運用了「苦戰」、「鬥爭」、「反抗」等話語，將血吸蟲病防治塑造為一場對

開展血防運動成為中共鞏固執政正當性、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必然選擇。在動員群眾的過程中，幹部有意識地運用了「苦戰」、「鬥爭」、「反抗」等話語，將血吸蟲病防治塑造為一場對抗敵人的政治、軍事行動。

抗敵人的政治、軍事行動(頁110)。而在領導層內部，血防運動掌舵人的變更同樣與政治運動和政治觀念密不可分。如前所述，1955年底，毛澤東從公共衛生部手中奪取了血防運動的直接指揮權，並將其上升為衛生工作的第一優先事項。權力的變更不僅暗含政治精英對職能精英施行打壓的階級鬥爭隱喻，也與毛和公共衛生部的觀念分歧有關。公共衛生部主要由接受西方醫學教育的專職人員組成，在運動路線上採取西醫主導、重治療而輕預防的模式，但由於基層技術人才和醫療水平的限制，難以深入廣大鄉村地區以解決問題，這與毛對社會主義的構想和復興傳統中醫的願望是背道而馳的(頁30)。

由毛澤東直接領導的血防運動，從一開始便充滿錯綜複雜的權力考量。不同於當前醫療事業的高度專門化，毛時代開展的血防運動高度依賴基層政治領導的支持，這使得血防運動在地方的開展也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反右運動和文革爆發後，地方政府的權威被大大削弱，權力空缺變相將地方管理的重任加在鄉村幹部身上。特定的政治身份(而非專業技能)賦予他們在這場運動中的主動權；相反，具有專業技能的醫務工作人員如果不能獲得政治身份的認可，便會被簡單地異化為治療血吸蟲病的工具，在運動中被邊緣化，落到被動地位，難以最大化地發揮作用。

地方開展血防運動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大規模且長期的群眾動員。這是中共對革命時期成功經驗的沿用，動員方法本身即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政治特色，也是區別於

同期WHO瘧疾防治運動的重要方面之一。然而，最初的動員情況並不如主流宣傳的那般有效。在第三部分中，作者精確考察了1950年代上海、青浦、餘江三個地區的居民收入水平，通過詳實的數據揭示了接受專業治療的病患所面臨的經濟困窘。客觀的治療費用缺口和國家急於在短時間內消滅血吸蟲病的激進構想產生了現實矛盾，導致人民對政府和醫務人員的工作產生懷疑情緒。直到1966年以後治療完全免費化，群眾的懷疑才得以平息(頁168)，但尚不能夠調動群眾投身於血防運動的積極性。作者對動員情況進行進一步追蹤並得出結論：削弱動員效果的最大阻礙正是地方幹部和群眾將農業生產放在首位的觀念(頁143)。一旦血防運動的預防措施(如集中處理糞肥)、治療方案(如長期臥牀接受治療)與農業生產相衝突，血防運動就會遭到地方抗拒，更談不上有力的動員。影響運動開展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單純的政治動員很難打破現實利益的訴求。只有文革爆發之後，革命邏輯主導下的政治鬥爭裹挾而起的巨大政治熱情消解了群眾的抵觸心理，才使得群眾動員有力地發揮作用——這種導向本身也是政治運動所具有的典型特點。

當我們將目光放在來自地方的抵抗時會發現，因經濟方面的阻礙而形成的這種抵觸心理，在當時政治運動日盛的語境下難免與政治相勾連。在權力結構內部的鬥爭以外，民間對血防運動的認知也充滿了政治隱喻。作者重點考察了餘江縣的血防運動動員情況。位於革命聖地江西省的農村腹地，餘江縣在

一旦血防運動的預防措施、治療方案與農業生產相衝突，血防運動就會遭到地方抗拒，更談不上有力的動員。影響運動開展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單純的政治動員很難打破現實利益的訴求。

具體的防治規劃方面更大程度受到革命邏輯的影響(尤其和上海比較)。儘管知曉藥物滅殺的高效和簡便，江西省五人領導小組在1957年仍然堅持埋殺釘螺的方法要優於藥物滅殺(頁138-39)。原因顯而易見，埋殺釘螺的巨大工作量只有在高度集體化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實現；大量的人力投入可以彰顯人民群眾消滅血吸蟲病的堅定意志；淡化化學藥物的效用是在試圖降低西醫在該運動中所佔的權重。比起防疫，埋殺釘螺更像是一場政治表演，儘管在實效層面，投入和產出的不對稱反而加深了村民對於運動的懷疑。

血防運動的另一個政治隱喻來自於它的區分和規訓功能——地方在執行過程中擅自對特定群體賦予防治工作。在文革的前半期，餘江縣幹部有意將血吸蟲病防治的髒活、累活分配給「黑五類」，期望以此對他們加以政治規訓和改造，增強群眾對血防運動的認同和支持。然而，這種做法導致民間形成了對血防工作的刻板印象，將其視為對政治錯誤份子的懲罰，無形中強化了社會的抵觸(頁139)。革命邏輯就像一把雙刃劍，政治化的路徑為血防運動提供了新的發力點，同時也帶來了新問題。

1958年夏，毛澤東讀到餘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喜訊時，激動下寫就《送瘟神》詩二首。雖然「瘟神」事實上依舊陰魂不散，但這並不影響餘江縣作為毛親自樹立的「第一面血防紅旗」，被再造為一根政治標竿。餘江縣血防運動從此發揮示範作用，其所謂的對血吸蟲病的「根本消滅」難免帶有渲染的誇張色彩，因為作為毛親自樹立的典範，

它必須始終是成功的；餘江縣的防治工作從此直接受到中央的持續關注和政治壓力(頁35)。同時，在這場運動中建功立業的人員也獲得表彰和升遷的機遇，從而「增強了血防在餘江地域社會中的政治分量，使餘江縣域政治的『血防』色彩得以形成且長期保留」④。餘江縣在政治邏輯導向下實現的防治成果再次被政治化，並以此為中心，向全國傳遞了一個再造的政治隱喻。

三 觀念的革命與「科學」的傳播

毛澤東與公共衛生部的衝突屢次圍繞中西醫和城鄉醫療資源分配問題展開，其背後的政治邏輯是通過否定舊有權威，確立黨在科學領域的正確性和權威性。那麼「科學」概念本身該如何界定，才有利於實現這一政治目的？本書第四部分重點探討了影響血防運動全過程的兩個對立概念——「科學」與「迷信」。在防治過程中，西醫承擔了主要的科研和科教任務，代表了科學的一面；廣大農村地區對於風水、瘟神的迷信則嚴重阻礙了預防和治療工作。掌舵的毛面臨兩種選擇：站在科學的一側，依託現代科學解決血吸蟲病問題；或是站在迷信一側，順應廣大群眾的傳統慣性推進運動。但是選擇本身也帶來了一個政治隱患：選擇任何一方，都意味着賦予其政治上的權威。若外來的觀念構成霸權、營造統治空間，將會對黨的權威產生巨大挑戰。

於是毛澤東選擇了第三條路徑：發動一場觀念的革命，對「科

毛澤東選擇了第三條路徑：發動一場觀念的革命，對「科學」和「迷信」進行重新界定與改造，複合並用，以全新的理念指導公共衛生事業，杜絕可能撼動中共絕對權威的觀念的存在。

雖然毛澤東在運動之初試圖否定西醫、否定以往的「科學」概念，建立科學社會主義中新的「科學」之意義，但在實踐過程中，血防運動仍與狹義和廣義的「科學」都有着無法割捨的密切聯繫。

學]和「迷信」進行重新界定與改造，複合並用，以全新的理念指導公共衛生事業，杜絕可能撼動中共絕對權威的觀念的存在（頁182）。毛所設想的科學是一種將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結合的「草根」科學（頁205），它不要求嚴格的實驗規範和數據測算，而是群眾的、現實的和問題導向的，具有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在與西醫的鬥爭中，毛嚴厲批評他們存在過度迷信西方醫學理論知識、將中醫貶斥為「偽科學」、沒有堅持黨的領導等錯誤；原本代表「科學」的西醫被蒙上了「迷信」的落後色彩。針對傳統文化，毛主席主張「破舊迎新」，堅決反對迷信，打碎舊文化，為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開闢道路。民間信仰在運動中被重新賦予意義：寺廟被改建為病房，原來的墓地被劃為公廁用地，春節、清明節等傳統節日中增添了大掃除活動（頁188），從載體到內容的變化反映出迷信觀念一步步從民眾生活中被移除。而在血防運動過程中，中共發揚了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通過對病人人性化的關懷、培養運動積極份子、提升合作化參與度等方式鞏固在基層的權威，提高民眾對血防運動的支持，從觀念到行動、合理合法地介入了地方開展的血防運動（頁194-200）。

然而，在建國初期的西醫專業人才被打壓的同時，他們所使用的現代科學技術勢不可擋地向農村地區傳播，並與政治運動相結合，塑造了一批政治忠誠度和專業技能兼備的「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基層幹部。在這一點上，《送瘟神》與方小平《赤腳醫生與中國現代醫學》（*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的立論類似，方在書中指出，毛時代的赤腳醫生制度客觀上促進了西醫在鄉村地區的傳播與被接受^⑥。在方的研究基礎上，本書作者進一步構建了血吸蟲病基層防治工作的一個金字塔結構：最上層是西醫，他們參與預防和治療環節，但更重要的是負責藥物研發以及培養新一代具備專業知識的青年（其中很大一部分後來都成為了赤腳醫生）；中層由中醫和接受過訓練的護士構成；下層則是廣大基層工作者（包括赤腳醫生），他們作為金字塔的基石，在向上級傳達地方聲音和向基層普及公共衛生知識、組織社會動員等具體執行的任務上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頁225）。文革期間血防運動達到高潮，與這一防治工作結構的建立無疑有着密切關係。

血防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在現代社會，防治運動成功的背後必然暗含科學的邏輯或者結構。雖然毛澤東在運動之初試圖否定西醫、否定以往的「科學」概念，建立科學社會主義中新的「科學」之意義，但在實踐過程中，血防運動仍與狹義和廣義的「科學」都有着無法割捨的密切聯繫。科學工具在防治運動中的運用、科學對群眾教育的深刻影響，以及自下而上的信息蒐集機制的建立，都將血防運動導向成功。儘管毛試圖通過政治鬥爭來反對舊精英的權威，但在公共衛生層面，為了實現科學知識的普及，血防運動的開展不可避免地某些程度上表現出精英主義的傾向。受培養的「又紅又專」的基層幹部反過來以舊精英從事的科學教育為基礎，科學得到傳播，而防治系統的

金字塔結構在政治運動的語境下，專業人才和基層技術人才的政治身份被顛倒，呈現出在毛時代政治影響下特殊的對立與統一。

四 評價與反思

《送瘟神》一書僅用二百餘頁的篇幅，鋪開了一幅1950至70年代中國血防運動波瀾壯闊的畫卷。多樣而詳細的資料有力地支撐起全書的論證，第四部分結合組織社會學和管理學原理，從概念與結構入手的創新性解讀更是深化了本書的立論。在國內對血防運動問題已有相當多討論的前提下，本書仍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高敏站在體制外部，能夠更加客觀地對該運動的政治化色彩予以解讀，通過分析預防和治療等防治手段在動員上的受挫和轉向，打破了讀者的固有印象；正如前文提到的，作者以中外對比的全球視野將中國的血防運動放入國際背景中，通過比較突出了中國防治措施的特殊性。此外，作者也注意到血防運動初期他國防治經驗輸入中國的情況：接受西方訓練的公共衛生部沿用美國的防治方法，以治療為重點，相對忽視預防；蘇聯並未像中國那樣飽受血吸蟲病困擾，缺乏防治經驗，其公共衛生的實踐模式也通過實踐證明並不完全適合於國內的疫情防治（頁22）。更加突出的是，作者敏銳地注意到長期以來被國內研究低估甚至忽視的一個因素：與日本專家的合作。1950年代初，以小宮義孝為首的日本專家代表團通過實地考察，提出了一份以集體合作為基礎、重在

預防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工作方案，與毛澤東的政治設想不謀而合，深刻影響了血防運動的開展（頁31）。將本書與國內研究進行對照閱讀，將大大豐富我們對於血防運動的全面認知。

比起單純的醫療手段研究，《送瘟神》更傾向於展現血防運動與政治運動相結合的情景與該運動在基層帶來的實際影響，因此它更像是一部政治史和社會史的作品。誠然，在相當長的時段中，政治強勢地融入了中國當代社會的重重空間，如果貿然脫離政治隱喻的敘事，便難以理解各項集體運動得以發動的多重原因。但本書也有過於強調政治領導對衛生運動影響的嫌疑。例如，在論及文革期間血防運動走向高潮的原因時，作者主要歸結於政治熱情，以及被下放的專業人才培養基層技術人才並普及治療手段，這些因素歸根結底都是政治運動大環境下的產物。這一論斷偏重政治帶來的影響，相對忽視了地方民間的傳統慣性。楊念群在論及赤腳醫生制度時便指出，赤腳醫生的成功實踐是制度安排與人情道德雙重規訓的結果^⑥。中國的鄉村社會是一個道德與禮治佔有重要地位的「人情社會」，在政治動機以外，村民對於醫療工作者的奉獻普遍存有報恩心態；醫生和病人之間建立起私人聯繫紐帶，在情感上拉近了距離，消弭了運動開展時面臨的隔閡。當然，作者也並非沒有意識到地方社會裏非政治化的因素。比如她認為在不得不就醫的情況下，村民大多選擇自己更熟悉的、醫療風險相對較小的中醫，但這並不是為了響應毛澤東號召，而更多的是傳

比起單純的醫療手段研究，《送瘟神》更傾向於展現血防運動與政治運動相結合的情景與該運動在基層帶來的實際影響，因此它更像是一部政治史和社會史的作品。但本書也有過於強調政治領導對衛生運動影響的嫌疑。

防疫題材與現代科學觀念的結合，與當前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形成了巧合般的呼應，也使得本書的立論更具現實意義，引發讀者對於過去、現在和未來更深入的思考。

統的延續與現實的考慮。當我們將政治因素納入醫療史研究時，要警惕把醫務工作歸於政治支配對象的傾向，否則便會落入過度強調政治主導性的傳統政治史研究之窠臼，即使研究新題材、採用新方法，本質上仍是「舊史學」的延續。

本書的立論大致遵循了兩條線索：領導層發動血防運動的過程和權力分配、地方的具體執行階段。在分析運動如何在基層鋪開的部分裏，作者又將之分為幹部和群眾從抵觸到積極參與的態度轉變，預防、治療、教育三股力量的消長，防治結構的變化等幾個論題。這種非線性的敘述一方面有利於我們理解血防運動中錯綜複雜的影響力量，但另一方面，各個部分的交錯重合對全書邏輯的貫通造成影響。本文第二節的解讀即建立在對於《送瘟神》前三部分的綜合解讀之上，在整理過程中，筆者注意到本書一些敘述有所重複。又如，第四部分提到血吸蟲病防治模式與方法的實踐在血防運動初期產生了偏差，導致地方阻力增大，這一結果主要與第二部分的相關論述有所重複。如此將因果割裂，難免會擾亂讀者的思路。

此外，作為海外學者，作者對於中國文化的有限理解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她對血防運動的解讀。除了對「人情社會」傳統的忽視以外，文化的隔閡在語言翻譯中也體現了出來。如在列舉埋殺釘螺措施時，作者提到江西省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利用茶葉埋殺釘螺的做法，其中「茶餅」(brick tea)被翻譯為“teacake”(頁131)，中文的歧義導致了翻譯錯誤，可能影響讀者的理解。但瑕不掩瑜，總體來說，《送

瘟神》仍然是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作者對於「科學」概念的獨到理解和「科學整合」、「科學管理」兩個相關概念的提出尤其具有啟發性。防疫題材與現代科學觀念的結合，又與當前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形成了巧合般的呼應，也使得本書的立論更具現實意義，引發讀者對於過去、現在和未來更深入的思考。

註釋

① 王小軍：〈血吸蟲病與長江中游地區的社會變遷(1905-1978年)〉(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8)；王溪雲等：〈中國血吸蟲病防治策略的回顧與展望——慶祝建國60周年血防成就回顧〉，《江西科學》，2009年第6期，頁871-76；萬心、萬振凡：〈1950年代中共領導餘江血防工作的歷史經驗〉，《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頁109-16；彭慶鴻：〈20世紀50年代餘江血防與地方文化嬗變〉，《上饒師範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頁101-107。

② 〈第一面紅旗——記江西餘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人民日報》，1958年6月30日，第7版。

③⑥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頁589-95；564-65。

④ 萬心、萬振凡：〈疾病防控與地域社會政治變遷——以餘江血吸蟲病防治為中心〉，《鹽城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頁70。

⑤ Xiaoping Fang, *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2), 181-86.